

**编者按:**近日,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減負方案出臺不易,貫徹更難,這需要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學校、教師和家長思想統一、認識到位,才能執行到位。本報特別刊發一組相關評論,敬請關注。

# 让好心态成为教育的好生态

□朱永春

不可否认,当前某些地方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此等乱象如不加以制止,孩子的身心健康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但多年来,三令五申的减负不仅未达到预期效果,学生课业负担反倒越发沉重了。裹挟其中的教师、家长和公众在失望之余,也分析争论减负频遭夭折的原因。

其中最生动的一个解释叫“剧场效应”。说一群本来坐着好好看戏的观众,因其中一名站起来看而最后导致全体观众站着挤着。批评者在分析“剧场效应”时,主要责任直指剧场管理员。他们认为,板子不能打在搅局者和跟进者身上;导致集体秩序失衡,最后形成整体悲剧的替罪羊只能是教育行政部门,是这个管理员的不作为和脱岗所造成的。

如果罪魁祸首真的是那个剧场管理员的话,问题的化解就变得太简单了。只要把管理员叫回到剧场里,一声令下,立马秩序井然。那么到底是哪股力量真正触发了这个“剧场效应”呢?“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剧场效应的产生机制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相似性,本质上都源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口中的群体性恐惧。恐惧的本质是极度的不自信,极度不自信造成了盲目的从众。

在浙江省教育厅重磅推出新的减负政策之际,光有专家学者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思想统一认识到位是不够的,必须与

最大的焦虑群体——我们的家长与教师进行价值层面的沟通对话。通过沟通,凝聚共识,消除恐惧,从而优化教育心态,而好的教育心态才是最硬核的教育生态。

原始社会,因为自然科学知识的极度缺乏,人类对雷电风雨无限恐惧,继而产生敬畏,出现各种自然崇拜。今天,处在教育剧场中的人们也有着某种恐惧,那就是太多的人缺乏对人才成长规律的正确认知。患有这种恐惧症的家长和教师,往往会形成对升学考试的盲目崇拜,自己的孩子或学生一旦在学校考试排名中落后,就会滋生“怕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

问题在于,真正能走出人生精彩与成功之路的人,是否都非得赢在起跑线上?前阵子,新当选院士名单出来后,名单上有两位学术“大牛”是我的朋友。身边的朋友纷纷打听这两位学霸是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结果大跌眼镜。其中,施剑林院士当初就读的是南京化工学院水泥专业,朱永官院士读的是浙江农业大学土壤专业。可以说,在他们的大学时代,自己的母校绝非所谓的牛校,专业更都是“土得掉渣”。

缘何很多学术界领军人才就读一般大学,最后却能在学术方面后来居上?我听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观点来自朱永官院士。他说,智力有两类,一类叫低阶智力,另一类叫高阶智力。低阶智力是指认识已知领域知识的能力,主要表现为记忆力、理解能力,知识的整理、组织、储存和再现能力,顺从性合作能力等,我们所膜拜的学霸

很多只是低阶智力层面的强者:课堂上一点就通,刷题举一反三,学习上丝毫不需要家长教师操心,考试所向披靡,上重点考名牌如囊中探物。

而高阶智力表现为人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好奇心,自带一种挑战权威的勇气,学习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思维方式呈现独特性,富有批判和质疑的精神等。高阶智力出色的人,不一定在低阶智力层面具有同样的出色表现,甚至“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因为这样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质疑在前的谨慎,所以对教师与书本提供的内容不太会一味顺从性理解,而总喜欢自己来一番刨根究底。所以,他们在中小学阶段的学习效率并不很高,甚至有点大智若愚。

因此,我们不应该逼迫孩子早早成为学习成绩榜上的领跑者。人生不仅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而是一场类似铁人三项的运动。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可能是跑步,大学研究生阶段可能换成自行车比赛,最后踏入社会,也许比的是在未知大海的游泳能力。所谓的学霸状元,只是学知识的能手,但不一定是创造知识的高手,就像一个整理图书的管理员不能等同于一个会创作的小说家。

教育本不该是个封闭的剧场。因为人的个性、人的爱好、人的发展,都是无限而开放的。当价值观单一,过度地把个人的成功理解成竞争中的胜出者,而非生活的独立探索者、生命的积极体验者,我们就会陷入无知的恐



王 铎 绘

惧,蝇营狗苟,计较鸡虫得失,为观一场本无多大价值的所谓“大戏”,脚踏椅子,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剧场”中的家长和教师,也许缺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转身。其实,在孩子成长的广阔天地中,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何处不是精彩的成长舞台!

恐惧源自无知,当我们学会独立观察与思考,真正掌握了成长的真相,我们就会平息内心恐惧,不会盲目从众。教育也就不再继续上演不断加码的“剧场效应”,孩子也不会沦为“困兽”!

□胡欣红

在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由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一直以來備受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不僅是教育問題,也個社會問題、民生問題。減負早已是共識,是教育健康發展的大方向,但由於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近年來,不少地方的減負政策也遭到了一些家長的質疑乃至抵制。

為學生減負當然是好事,何以常常遭遇種種非議呢?減負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在升學競爭壓力山大的情形下,沒有人敢輕言放棄。然而,一旦減負措施沒有契合實際穩妥推進,極易引發家長的焦慮,甚至將其生生逼到了減負的對立面。因此,減負的大方向固然沒錯,但究竟怎麼“減”需要反復推敲,要講究方法,循序漸進,做好與家長的溝通解釋,不能忽視不同的聲音,一意孤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浙江的這份減負方案出臺,殊為不易,可圈可點之處頗多。

首先,減負方案是在前期摸底調查基礎上成文,並充分徵求和採納了社會各界意見,制定出臺過程可謂鄭重其事,在凝聚共識方面做足了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10月發布的徵求意見稿里,其中的“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不作業”條目,一度引發外界熱議。一些網友將其拎出來單獨看待,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盡管如此,出於穩妥起見,正式印發的方案還是刪除了“小學生晚9點不作業”的相關表述,可謂從善如流。

其次,減負方案目標明確,思路清晰,對症下藥。中小學生減負要減的是過重的校內外學業負擔,不是簡單地縮短在校時間、減少作業量、降低課業難度,而是要把校內外不合規、不合理、不科學的過重學業負擔減下來。同時,要把思政、音樂、體育、美術、勞動實踐教育等方面有欠缺、未達標的強化起來。有減有增,該減則減,該增則增,有效避免了減負的簡單化、粗暴化問題。

最後,減負方案標本兼治,綜合施策,通力保障。減負之難,難在千頭萬緒,難在千差萬別的個別需求。因此,減負工作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須突出重點,綜合施策,既要關注“本”的問題,也不能忽略“標”。浙江40條減負重點舉措,囊括了方方面面,彰顯了減負的決心,更提供了可操作的減負指南。減負是一套組合拳,需要切實加強各方協同。參與聯合發文的14個部門,各司其職,給減負的落實推進提供了有力保障。

減負是共識。之所以有爭議,並不是大家不願意減負,而是反對肤淺表面形式主義的減負。凝聚共識,科學部署,穩妥推進,這樣的減負才能成為家長和學生的福音。如何切實轉變有關減負的片面認識,避免教育系統單兵作戰,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分工協作,校內校外並舉,線下線上聯動,學校、家庭、社會合力的減負工作新格局,可謂任重而道遠。

# “减负40条”彰显系统治理思维

□程振伟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这个“减负40条”,谈思路、立举措、促共治、求实效,体现出教育办教育的情怀,彰显出严密细致的系统治理理念。

教育部出台“减负30条”,浙江省则贯彻以“减负40条”,决策者的用心是在告诉世人:减负非哪家独自之事,需要系统思维,需要群策群治。当然合力的前提是共识,能凝聚最多人、最具代表性的共识。“减负40条”,直指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是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在作怪,是升學觀、就業觀、錄用觀的扭曲,以及社會壓力、教育功

利、家長焦慮的層層傳導。減負是治標,去“五唯”土壤才是治本。“減負40条”从治标更要治本的共识出发,有说服力,有穿透性。

说起减负,有些家长疑惑,把孩子们从过重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就是为了给他们腾出玩游戏的时间吗?“减负40条”给出了解答。不是绝对的“减”,“减”是为了“增”。正所谓“三减三增”,即减作业、增睡眠,减补习、增运动,减刷题、增实践。减负不是为了让孩子没事可做,而是为了长身体、多运动、勤实践,只有推开过重学业负担的巨石,才能为素质教育腾出高地。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有历史沉疴,也有现实社会压力的传导。向学业负担过重开刀,非得有系统治理思维不可。以往说起减负,有评

论者常常说“关键是考试招生制度指挥棒”。“减负40条”中特地要求“规范区域和学校组织的考试评价”,相关规定多达7条。同时,还明确了提高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等有效举措。恶性竞争搞得人人自危,导致抢跑疯跑。只有梳理好教育系统环境,才会让所有人按规矩来,按教育规律来,才能助力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减负减了很多年,但收效甚微。以往一个大的失误在于单方面用力,造成了“按起葫芦浮起瓢”。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不是學校一方之責,是學校、家庭、社會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規範校外培訓、進入中小學校的競賽與活動管理,落實家庭教育責任等,“減負40条”里有8条,就是用系統思維來考量減負問題,不能再

让培训机构把学校释放出来的时间都接盘了,培训机构要接受监督服从治理,不能再成孩子减负的“旋转门”“跷跷板”。

系统治理,还要有政府的强力推动。14个部门各就各位,地方政府更要摒弃错误的教育政绩观,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中考升学率、高考一段上线率和上“北清”人数等评价考核教育部门。反之,要用小學生學業負擔指數來衡量他們是否在減負上陽奉陰違。

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學生身心健康的過重學業負擔,是教育之敵,必須來一場系統全面的“教育之治”。堅決有力落實好“減負40条”,讓孩子的休息、運動、實踐時間和機會多起來,讓他們從素質教育中受益,讓每個人臉上的笑容多一點。

# 何不读懂其间的爱与暖

□邓海建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这个被民间简称为“减负40条”的地方政策,自公开征求意见起,就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

中小学减负向来是个“槽点”满满的话题。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如果过于宽泛,或被埋怨没有力度、没有创见;如果过于细致,又被诘责管得太宽、一厢情愿。事实上,不少省份的新一轮减负政策,大多遭遇到了各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舆情烦恼。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答记者问时亦直言: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

文件。但恰如古诗所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

相比之下,浙江版的“减负40条”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思路明确。比如“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和过于功利化的教育观,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观”等,指向的是浙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愿景。

二是共识清晰。浙江强调,减负不是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降低课业难度,而是要把校内外不合规、不合理、不科学的过重学业负担减下来。说明浙江的“减负40条”并不是个一刀

切的拍脑袋决策,而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辩证增减学业负担的统筹安排。

三是操作有度。“标本兼治”“各方协同”“突出重点”,强调的是长效和系统思维,强化的是效能和价值导向。至于最受关注的“40条”重点举措,基本彰显的还是可操作、更务实的立法初心,不打马虎眼、不玩虚的,让每一家“责任单位”都能明晰具体权责关系。

减负是个系统工程。学生学业负担重的病症,是学校、家庭、社会等主体多种因素交叉感染的结果。在过重学业负担的背后,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等观念的根深蒂固,是升学观、就业观、录用观的扭曲及社会压力、家长焦虑的击鼓传花。

客观地说,浙江版“减负40